

# 中共建國精英 是如何選擇中國共產黨的？ ——對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分析

●周陸洋

**摘要：**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起源，已有的解釋主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學術界的傳播，以及中共對底層農民的動員。本文基於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77名成員的傳記資料，着重探索中共建國精英選擇共產黨的過程及其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解。本項研究揭示了三種機制：「階級阻隔」、「政治選擇」和「組織覆蓋」。階級阻隔機制剝奪了中共精英接受高等教育以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增大了其捲入激進政治的可能性，是影響77名中共精英命運的覆蓋性法則。政治選擇機制適用於具有共和革命或舊軍閥背景的精英才，他們加入中共主要是出於對列寧主義動員手段和軍事組織技術的興趣。組織覆蓋機制更多影響那些來自農村和城市底層的精英，這些人已經捲入激進政治並面臨國家鎮壓，中共則通過為其提供組織保護，形成持續激進化的路徑依賴。這三種機制並不具有決定論意義，而是研究對象最具普遍性的特徵，需要通過大量次級機制起作用。從革命過程來看，中共精英對馬列主義只有兩個寬泛理解：民族主義和階級平等。這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理解為甚麼中共建國後對僵硬的蘇式計劃經濟缺乏一以貫之的熱情。

**關鍵詞：**中共革命 建國精英 階級阻隔 政治選擇 組織覆蓋

關於中共革命的起源和發展，主流的解釋框架是「思想起源說」和「大眾動員說」：就「思想起源說」關注的論題，即為甚麼一大批知識份子信奉共產主義，相關的解釋可以歸結為「政治危機理論」，即出於對舊式民主革命的失望，一部分知識精英開始關注俄國革命，進而在共產國際協助下投身於共產主義革命，並建立了中國共產黨<sup>①</sup>；對「大眾動員說」的論題，即農民為甚麼

\* 感謝麥吉爾大學社會學系 John A. Hall 教授、政治學系王娟教授，魁北克大學 Marcos Ancelovici 教授以及三位匿名專家對本文的評閱，一切錯誤和不妥由筆者本人負責。

參與共產黨革命，主流解釋經歷了從強調「認同」到強調「強制」的轉變。早期研究認為，中共的農村革命激發了農民的階級和民族認同，使其自覺響應中共動員；晚近的文獻則認為，中共革命所具有的強制性和暴力性的動員策略和技術，是其能夠成功動員大量農民的關鍵<sup>②</sup>。

本文的研究路徑關注「精英形成」，即中共建國精英走上共產主義革命的過程。相比早期知識份子和後期農民參與者，這一群體的最大特點在於直接主導了中共革命和建政過程，並在1949年後長期執政。研究這一群體接受共產主義的過程及其對共產主義的理解，對於了解中共革命的興起以及中共政權的形成和改革，都具有重要意義。這部分精英並非高級知識份子，很難用思想或意識形態因素的辨析來解釋其行為；而他們捲入革命又在中共割據政權建立穩固的社會控制之前，具有一定自由選擇餘地，因此不能簡單以強制動員來還原其動機。在分析方法上，這一群體人數眾多但易於界定，便於歸納模式和機制，也能夠從經驗上做深入挖掘。

本文的具體研究方法是基於傳記資料，對1945年在延安產生的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包括44名正式委員和33名候補委員，進行入黨歷程分析。以這一群體成員作為分析對象的原因很簡單：這是中共革命成熟後形成的首個領導集體，且完整參與了政權奪取和設計過程。此前的中共領導集體並不穩定，其大部分成員經歷過大規模清洗和流失，並未對中共革命和建國過程產生實質性影響；而此後的中央委員會雖有少數人因病逝世或叛逃而需遞補，但很大程度上仍由這一群體的精英主導，如果單獨分析，個案的原生性稍顯不足。當然，本文得出的結論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不能推廣到那些在中共奪取政權時還比較年輕的高級幹部，以及晚近的中共領導人。

在具體的問題設置上，本文不是泛化地討論中共精英為甚麼選擇加入共產黨，而是重點解釋他們為甚麼沒有選擇中共革命的最主要敵人——國民黨，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民國上層社會。本文歸納出三種他們選擇共產黨（或曰與國民黨區隔）的機制：（1）「階級阻隔」：一些中共精英原本有可能進入國民黨或上層社會，但由於繼承了父輩不利的階級地位，未能獲得所需的專業和教育背景，最後在各種偶然因素的作用下轉向激進政治；（2）「政治選擇」：一部分中共精英曾經進入過國民黨並已獲得一定地位，但在對國共兩黨進行長期反覆的比較後，最終選擇了中共；（3）組織覆蓋：許多中共精英在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初始就「偶遇」高度密集的中共組織網絡，捲入激進政治後，為躲避當局的政治鎮壓而產生路徑依賴。這三種機制並不互斥，而是以不同的強度同時作用於不同的個人身上。這些機制也並非以決定論式的法則發揮作用，並不能「決定」某個個人是否加入中共。它們能否起作用，取決於個人化的歷史情境和諸多次級機制。當然，這一解說也有其局限性，它不能回答的問題是：為甚麼中共建國精英沒有捲入傳統農民抗爭或鄉村秘密社會，又或複製其父輩的生活方式。

本文對「選擇共產黨」這一概念的界定相對簡單，即精英加入中共及之前持續提出申請的過程。這一界定是可操作的，因為這批中共精英的入黨過程普遍比較簡單，很少有入黨之後又行脫黨的反覆，而這類行為在早期知識精

英和底層農民黨員中則是比較常見的。當然，「選擇」是一個較為泛化的提法。對許多中共精英來說，入黨並不一定建立在理性選擇的基礎之上。但考慮到幾乎所有精英對於競爭性政治力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比較和思考，本文在題目中仍然使用了「選擇」這一提法。

本文的主要參考文獻是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傳記資料，包括年譜、自述（回憶錄、日記、自傳）、傳記和傳記性研究論文。資料的數量和質量因傳主而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年譜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其優點是並不預設主題，按照時間順序呈現所有可以展示的材料。但年譜資料的範圍有限，一般局限於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回憶錄、日記等自述的優點是細緻呈現傳主的內心活動，缺點是資料呈現有較大選擇性，許多作者已不自覺按照官方經典敘事重構其回憶。傳記的質量參差不齊，由中共文獻部門、軍事科學院等單位組織編寫的傳記擁有較翔實的檔案資料，但往往加入編者的主觀想像；相反，個人編寫、由地方出版社發行的傳記反而較少受到主流意識形態束縛。另外，去世較早或在政治上長期邊緣化的中央委員沒有系統的傳記、年譜或回憶錄，對他們的研究只能依託零散的傳記性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大多發表於同行評議類學術刊物，質量較有保證。在同一人物有多種傳記資料時，筆者優先使用年譜，然後依次為自述、傳記和研究論文。

傳記資料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意識形態偏見，本文的應對方法是「各取所長」。由於意識形態限制本身時鬆時緊，且標準不斷變化，各類傳記資料都可能不經意間反映某些暫時不受審查的「真實情況」。如果我們假定中共建國精英的革命經歷具有較高的同質性，就可以用一些傳記資料提到的細節推測其在總體中的分布。此外，筆者還借助關於革命與社會運動的社會學理論減弱傳記資料的意識形態偏見影響。這些理論大多在歸納比較世界多國社會運動的基礎上形成，關注但不受制於中國這一具體個案，其視角能夠幫助筆者發現傳記本身沒有明確闡釋、甚至傳主本人也未能完全意識到的政治激進化機制。當然，完全消除意識形態偏見是很難做到的，這也是本研究的一個局限。

## 一 階級阻隔機制

中共建國精英的一個共同背景是父輩階級地位很低（見表1），其直接影響是制約了這些精英在原政治和社會體系中的向上流動，形成階級阻隔機制。中共精英並不都在政治社會化的起點就已確定選擇激進政治立場。他們和同時代許多青年人一樣，具有模糊的向上流動願望，且十分有可能進入國家政權，或成為專業技術人才，但不利的家庭經濟狀況剝奪了他們的教育機會，使他們無法獲得實現這種願望所需的專業背景和學歷要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很容易捲入激進政治：相比於暗淡的職業前景，捲入政治運動或軍事鬥爭至少還意味着些許不確定的「向上」機會。

一個曾經十分流行的觀點是，中共革命精英並非來自社會最底層，因而才有可能「分身」出來革命<sup>②</sup>。這一觀點很大程度上具有誤導性。如表1所示，

表1 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階級背景

正式委員		候補委員	
父輩職業	人數	父輩職業	人數
農民	21	農民	24
鄉村教師	6	鄉村教師	1
小商販	6	小商販	0
小地主	5	小地主	4
中下級官僚	2	中下級官僚	1
農村手工業者	1	農村手工業者	1
城市貧民	1	城市貧民	0
律師	1	律師	0
大地主	1	大地主	0
職業革命家	0	職業革命家	2
<b>總計</b>	<b>44</b>	<b>總計</b>	<b>33</b>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傳記資料整理，下同。

一部分中共精英的確出身於小地主或富農家庭，接受了私塾教育和高等小學教育（比如毛澤東、劉少奇、劉伯承、李立三），但即便這樣的家庭，也很難負擔其子女在大城市接受正規高等教育的費用，更不必說像許多國民黨官員或專業人才那樣去發達國家留學。在所有77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中，除了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的陸定一，幾乎沒有人取得高等教育學位。許多中共精英都有因為家庭資助斷絕而從中學輟學、被迫回到家鄉擔任小學教員甚至務農的經歷（比如林彪、董必武、陳伯達、張際春）。有海外留學經歷的中共精英（留俄學生除外）也基本以輟學結束其教育過程（比如周恩來、王若飛、陳毅、聶榮臻）。

在完成初等教育之後，家境不佳的中共精英通常通過以下幾種方式繼續求學：(1) 入讀不收學費的師範學校或專業技術職校；(2) 入讀國家資助的軍事院校，如軍閥開辦的陸軍講武堂；(3) 參加北洋政府資助的西歐「勤工儉學」計劃；(4) 負笈學費相對便宜的日本留學；(5) 參加中共組織的蘇聯留學；(6) 入讀中共開辦或滲透的大學。這些渠道無一例外處於政治激進主義的影響下。

師範學校和技術職校一方面將學生置於大城市和文化中心，使他們很容易接觸到政治激進主義，但另一方面又未實質性地改善學生的就業前景或專業資歷。建國後擔任交通部長的王首道就提到，自己在高等小學畢業後，由於缺乏經費，只進入了一所農業專修學校，畢業前夕自覺就業前景渺茫，開始積極追隨平時已有聯繫的中共活動份子<sup>④</sup>。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則回憶說，自己在入學前學習興趣高漲，但由於早年在農村私塾沒學過數理化，進入湖南省立師範學校後學業「跟不上」，逐漸對專業失去興趣，轉而關注政治社會問題<sup>⑤</sup>。

西歐留學生也有類似的問題。比如五四前後法國和比利時的「勤工儉學」計劃，並不基於中法政府的雙邊協定而開展，只是北洋政府個別官員或教育者的一廂情願。這些項目的參加者並未被任何大學正式錄取，僅僅是自籌經

費的學生。此外，項目管理極為混亂，政府承諾的生活費經常被拖欠或被貪官侵吞；而戰後法國軍工生產萎縮，就業困難，導致學生根本無法安心學業。當時法國社會主義運動高漲，一些學生積極份子對北洋政府失望，又受到法國政府的鎮壓和歧視，一心尋找「超越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很快便捲入了共產主義活動，甚至由此成為中共的創始人<sup>⑥</sup>。

日本留學生的情況與西歐略有不同。留日學生多為中共精英中年齡較長、資歷較深者。他們在日本參加了孫中山共和革命，回國後輾轉各地、頻繁更換政治信仰，最後才加入中共。留日潮的背景是二十世紀初科舉制的衰落和廢除，許多家貧學生在國內升學或做官無門，只能追求相對便宜的日本留學。與留法項目相似的是，這些學生也沒有被正規大學錄取，而是依附在各類自修機構下，甚至處於無人管理的自學狀態。長期負責中共總務工作的林伯渠就畢業於專為中國學生開設的半年速成師專<sup>⑦</sup>。中共元老吳玉章則就讀於中國學生自己合夥建立的臨時速成班<sup>⑧</sup>。中共統戰領導人王若飛所進的東京明治大學更是既無老師也無管理，全憑學生自學<sup>⑨</sup>。在經濟窘迫、政治動蕩、學業前景不明時，這些學生很容易參加革命活動甚至輟學回國。當然，留日並不必然通往共產主義。後來成為國民黨高級軍官或統帥的留日學生，往往能夠依託殷實家境或公費資助，進入正規的日本軍警法政學校，回國後成為民國新貴。國民黨一些重要軍政人物，如蔣百里、閻錫山，都有這樣的經歷<sup>⑩</sup>。

1920年代初中共組織的蘇聯留學和社會大學計劃，吸收了一些無力繼續在正規學校求學的青年學生。這些學生在加入留俄計劃之前並未信奉共產主義，對這一意識形態也並不了解。對他們而言，留俄計劃的吸引力很大程度在於提供了一個走出國門、領略精彩世界的機會<sup>⑪</sup>。比如，劉少奇當時已經考取了北京大學，但無力承擔學費，又不願就讀免費的獸醫專科學校，甚至連赴法勤工儉學的費用都難以湊齊，只是在南下過程中偶然得知中共的留俄計劃，才抱着看一看的心態參與其中<sup>⑫</sup>。

留俄學生的激進化過程與留日、留法學生不同。這些學生在蘇聯受到很大刺激——儘管內戰後的蘇俄處境極其困難，但他們仍然享受了物質上的特別優待，而且作為貴賓參加了大量高級別政治活動，甚至能與蘇聯最高領導人對話、交談。這無疑比他們在國內的境遇好得多。這些學生對蘇聯的文明程度也有深刻印象。中共首任駐蘇大使王稼祥就在回憶錄中提到，所在學校多數蘇聯教師能夠自如使用英語，工廠機關則設有完備的俱樂部和附屬娛樂設施，令人震撼<sup>⑬</sup>。這些學生接受共產主義，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將共產主義與蘇聯的發達和舒適生活聯繫起來，儘管他們對蘇聯的觀察是十分有限和片面的。

需要說明的是，階級阻隔機制並非這樣一個過程：中共精英原本一心想躋身上流社會並成為高級軍政官吏或專業人才，卻由於家境較差一再碰壁，之後出於對整個上流社會的仇恨，憤而轉向激進政治。這一假設並不符合事實。限於早年有限的視野，大多數中共精英對「上流社會」並沒有清楚的概念，更談不上一心追求功名。科舉制度取消、清朝滅亡、軍閥混戰，使中

國經歷了價值觀、教育體系和政治系統的斷裂。人們對於如何實現社會流動以及何為真正的向上流動，一時間並沒有清晰穩固的共識。中國革命正是在這樣的「帝國廢墟」上起源並壯大的<sup>⑭</sup>。對中共精英早期政治觀念之形成產生更大影響的，是其在初等學校中接受的民族主義教育，以及基於低下階級出身而要求改變現有社會結構的意願。這樣一種初始的政治觀念，在後來的社會化過程中不斷被重新塑造，逐步將這些精英引向共產黨組織。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進一步闡述階級背景的巨大影響：首先，階級背景嚴重限制了中共精英的發展視野，導致他們缺乏進入上流社會所需要的信息，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早年還缺乏制訂清晰生涯發展目標的知識；其次，即便在生涯發展目標明朗之際，階級背景也確實限制了他們的選擇空間。如果這些中共精英在升學等關鍵時點上沒有受到家境的制約，他們很可能成為收入豐厚的專業律師、醫生或軍官，也就較少可能捲入激進政治。總之，階級背景的限制是隱性的，它在中共精英能夠作出「選擇」或嘗試之前，就將一些重要選項排除或「置後」。

## 二 政治選擇機制

政治選擇機制很大程度上是一個遵循理性選擇邏輯的官方神話：鴉片戰爭以來，愛國者長期探索救國道路，他們中的先進者最後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解釋也被許多西方學者接受，認為中共革命起源的重要原因是知識精英對舊式共和革命的失望。本文並不完全否認這一機制的的作用，但有幾點補充：(1) 這一機制並非單一的決定性機制，而是在階級阻隔、組織覆蓋等多重機制的協同下起作用；(2) 由於假定了一個複雜而系統的理性選擇過程，它的適用範圍比較有限，僅對那些具有舊共和革命經歷和舊軍閥背景的中共精英具有解釋力；(3) 在具體歷史情境中，共產主義並不以「馬列主義」這樣的學術性話語形式出現，而是呈現為許多具吸引力的技術性手段，比如組織暴動、平息政權內部矛盾、對軍隊的管理等。

政治選擇是理性選擇，其前提是：(1) 選擇者具有明確而一貫的價值目標，並根據這一目標來選擇手段，而共產主義或非共產主義，在選擇者看來都是手段而非目的；(2) 具有一個平台，使選擇者能夠對不同手段進行系統、長期、反覆的比較，並選出最優手段。顯然，並不是所有的中共建國精英都具備上述政治選擇的條件，但中國革命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生態，的確為政治選擇機制提供了某些運作條件。就一貫的價值目標來說，中國在近代早期就形成了比較明確而清晰的現代民族主義，力圖恢復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sup>⑮</sup>。這一價值觀通過新式學校教育傳遞給了中共革命精英，是比較沒有爭議的。就政治選擇的系統比較而言，中國政治主要提供了三個平台：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軍閥混戰與反軍閥戰爭；對日戰爭。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是兩黨各自展示力量與優勢的場所。此時的中共雖然尚未建立獨立武裝力量，但也參與指揮了一些作戰。平時中共

的政治工作者經常來校演講，有意無意形成與國民黨理論工作者對比的態勢。這都為黃埔軍校的學員提供了系統比較的素材。大批中共建國精英是在黃埔軍校就學之後決定加入中共的，他們本身具有舊軍隊背景，深知舊軍隊的弱點。在發現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組織方式能夠克服這些弱點後，他們便選擇加入中共（儘管不一定是在當時）。比如後來成為中共元帥的徐向前就提到，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來校演講，久而久之便發現中共演講者和蘇聯顧問的水平比較高<sup>⑩</sup>。長期在孫中山衛隊任職的葉劍英則發現，中共動員大眾籌集軍費的方式，遠比孫有效率<sup>⑪</sup>。當然，並非所有黃埔軍校背景的中共精英都是如此。許多人在進入黃埔軍校前就已經是中共黨員和積極份子，他們參加大革命本身就是根據中共的指令行事。也有一些舊共和主義者雖然一度接受中共感召，卻在國民革命失敗後復投國民黨，比如後來官至國軍中將的于樹德。與中共精英不同的是，他原本就完全具備進入國民黨政權上層的背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曾是北京大學教授<sup>⑫</sup>。這也說明，階級阻隔所形成的路徑依賴是推動中共精英持續激進化的覆蓋性法則，不以階級阻隔為基礎的政治選擇不具有長期穩定性。

漫長的軍閥混戰和反軍閥戰爭是民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特徵。一些資歷較深的中共建國精英，早先是共和革命的參與者，參加過辛亥革命、護國戰爭和護法戰爭，以及軍閥之間的交戰。這段漫長經歷足以使他們反覆檢驗舊式民族主義的弱點，並導致了對舊式共和革命的熱情衰竭。他們對舊式共和革命的動員方式存有質疑，認為利用軍閥矛盾、與幫會組織結盟的策略屢戰屢敗，並不能真正消滅軍閥。這種質疑不斷被一次次政治衝突證明是合理的。有時候，他們則是在親屬被殺，或本人因捲入軍閥衝突而險些喪命之後，下定決心另謀出路。比如廖承志在其父廖仲愷被刺後，對國民黨產生道德疑問，進而接觸共產主義思想，後來成為中共統戰系統的創建者和長期領導人<sup>⑬</sup>。朱德在軍閥混戰中成為襲擊目標，逃出雲南後，在德國接觸到中共組織，回國後與毛澤東共同建立了中國紅軍<sup>⑭</sup>。中共創始人董必武則是在其庇護人蔡濟民被殺後決心脫離軍閥隊伍，投身教育運動，其間逐漸與早期共產主義活動者建立聯繫<sup>⑮</sup>。民國軍閥混戰過程與早期現代歐洲「戰爭與國家形成」過程十分相似：殘酷而持續的戰爭反覆檢驗各種不同類型政權的資源動員能力，在比拼集體工具理性化的激烈競爭中，帝國、王朝、城邦等傳統政體形式逐漸衰落，現代民族國家異軍突起，成為現代政治的主導形式<sup>⑯</sup>。

最後一個較為重要的比較平台是對日戰爭。這裏更多是提供了軍事組織技術的比較。建國後長期負責中共軍工科研的萬毅在抗戰爆發前夕已經是國民黨東北軍高級軍官，並參與了南京保衛戰；他看到國民黨部隊內部矛盾重重，直接導致了南京防禦瓦解，欽慕中共部隊的政治工作制度，認為中共模式能夠解決國軍的傳統問題<sup>⑰</sup>。類似的案例還有著名將領呂正操。張學良被蔣介石拘禁後，東北軍內部派系鬥爭激烈，呂的部隊則在梅花鎮遭到日軍的殘酷虐殺，這最終促使呂和中共取得聯繫，脫離東北軍<sup>⑱</sup>。這種轉變也並非一蹴而就：東北軍在戰前就不斷派出軍官到日本進修軍事，其中一些人加入日本共產黨，回國後秘密建立網絡；而東北軍軍官與中共一直也有私人接

觸<sup>26</sup>。對舊共和革命者和舊軍官而言，中共及共產主義並不呈現為知識上的吸引力，而是代表了有效率的軍事組織技術和社會動員手段。

除了上述三個平台外，政治選擇機制在其他一些次要情境中也起作用。毛澤東的老師、中共教育工作元老徐特立在入黨前，並沒有任何共和革命或軍隊服役背景，而是長期信仰教育救國。五四運動前後他曾自費赴法國勤工儉學，了解西方教育制度；回國後又建立長沙女子師範學校，逐漸與中共網絡接觸，但直到1927年才加入共產黨<sup>26</sup>。中共建黨者之一陳潭秋長期信奉共和主義學生運動，後來通過馬列著作閱讀，逐漸轉向共產主義<sup>27</sup>。一個更著名的個案是毛澤東。毛在很長時間裏信奉無政府主義和鄉村實驗，他參與中共活動是在經歷了複雜的思想辨析和實踐比較之後<sup>28</sup>。

定性分析之外，筆者對政治選擇機制在77位中共建國精英中的總體分布情況做了一個定量描述（見表2）。首先，在44名正式中央委員中，有13人的入黨歷程符合政治選擇機制，而在33名候補委員中，只有4人的入黨歷程符合這一機制。這一差別似乎表明，政治選擇機制更多與中共的創建過程聯繫在一起，成熟階段的中共則更多通過嚴密的組織網絡招募成員。其次，定量描述還呈現出政治選擇機制的三個子類別：舊軍閥背景、同盟會背景和獨立背景。這裏的「舊軍閥背景」包括國民黨東北軍軍官；「同盟會背景」包括雖然沒有直接參加辛亥革命、但與孫中山等人有密切聯繫的革命精英；「獨立背景」則包括教育救國、鄉村實驗、共和主義學生運動等實踐者個人長期堅持探索的非共產主義路線。一個需要說明的特殊案例是後來擔任過中共西南地區軍政領導人的王維舟。他早期在軍閥部隊服役，後來加入朝鮮共產黨（當時中共尚未成立），在從事多年共產主義宣傳後，才於1927年轉入中共<sup>29</sup>。由於其經歷可能存在系統化的長期比較，筆者也將這種情況歸入政治選擇機制。

表2 政治選擇機制的分布情況

	舊軍閥背景	同盟會背景	獨立背景	總計	百分比
正式委員 (44)	5	5	3	<b>13</b>	29.5%
候補委員 (33)	3*	1	0	<b>4</b>	12.1%
<b>總計 (77)</b>	<b>8</b>	<b>6</b>	<b>3</b>	<b>17</b>	<b>22.1%</b>

\* 包括候補委員王維舟的特殊案例

最後要補充的是，寬泛定義的政治選擇機制幾乎存在於所有人當中。沒有人從一開始就是共產主義者，總是或多或少地接觸到非共產主義信息，在比較之中作出某種選擇。在新式學堂中，未來的中共精英並不能清楚區分共產主義與非共產主義作品，幾乎是一併加以閱讀。馬列著作的艱深也限制了系統深入的鑽研。西方有學者認為，中共精英對馬克思主義的關於社會規律的闡釋普遍理解不足，傾向於誇大主觀意志在社會改造中的作用<sup>30</sup>。這顯然與對經典的閱讀較為簡略有關。甚至有中共領袖承認，自己沒有讀過太多馬列主義經典，主要還是借助簡單的二手資料<sup>31</sup>。既然如此，為甚麼許多人仍然加入了中共？這就是組織覆蓋機制所要回答的問題。

### 三 組織覆蓋機制

並不是所有的中共建國精英在經歷了複雜的系統比較後都從「前共產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對多數人而言，他們在政治社會化的起點就「遭遇」了中共的組織網絡，進而捲入了激進政治。這一組織覆蓋機制看起來非常具有偶然性，但實際上受到兩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支配：(1) 中共極具滲透性的列寧主義組織網絡，能夠將觸角深入到國民黨和軍閥難以到達的鄉村和基層<sup>⑳</sup>；(2) 國家的鎮壓產生路徑依賴效應，讓一些最初不經意捲入共產主義運動的積極份子不得不繼續留在中共網絡內以求得到保護<sup>㉑</sup>。前者保證了「接觸」，後者則確保了「接觸」後果的長期維持。

「遭遇」的極端表現形式是親緣網絡。一部分中共精英在人生起點就遇到了中共網絡——其父母或兄弟。這些人也簡單地接受影響、子承父業，包括建國後的中共婦女工作領導人蔡暢（其兄為蔡和森）<sup>㉒</sup>、內務部長曾山（其父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曾彩芹，其兄為中共早期黨員曾延生）<sup>㉓</sup>、福建省委書記曾鏡冰（其兄嫂、堂伯父均為中共黨員、海南地方農會領導人）<sup>㉔</sup>、金融領導人李葆華（其父為李大釗）<sup>㉕</sup>和林彪（其表兄林育英和林育南均為中共黨員）<sup>㉖</sup>。但這種情況也符合組織覆蓋機制的兩個基本特點：(1) 持續而高強度的政治灌輸；(2) 因與革命者有親屬關係而容易遭遇當局迫害、出於復仇和安全目的繼續革命。

在親緣關係這種極端形式之外，更具典型性的情況是遭遇共產黨與其他政治力量的競爭。如前文所述，大多數人在政治社會化的起始階段都會同時接觸不同流派的政治思想；而且，中共在建立初期與國民黨幾乎融為一體，區別並不明顯。但中共在組織網絡上的高度滲透性以及持續的組織活動，使之能夠在長期中戰勝國民黨或軍閥的影響，吸收一批穩定的積極份子。比如陳雲在商務印書館做職員時，同時遇到了國民黨和中共的政治工作者，甚至還在前者的勸說下加入了國民黨；然而，在上海軍閥宣布驅逐國民黨後，他的入黨介紹人便再也沒有出現，只有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潛伏下來長期與之互動。按照陳雲的回憶，同樣是做政治工作，國民黨只是抽象地談論三民主義，而中共則會組織工人爭取福利<sup>㉗</sup>。

中共重點滲透的兩個領域，一是各類師範學校或專業學校，二是農村。這就說明了為甚麼中共建國精英在進入這些場域後，很容易捲入激進政治。檢視中共建國精英的傳記資料甚至會發現，許多人主要來自幾所著名的學校，比如湖南省立師範學校和山西省立師範學校。雖然國民黨在中心城市的大學也設立了與中共競爭的學生組織<sup>㉘</sup>，但它對偏遠地區、特別是軍閥實際控制區域內教育系統的滲透，卻遠不如中共。中共在滲透進一所學校後，往往能夠迅速發現該校內部的矛盾，比如貧家子弟與富家子弟的矛盾，學生與校長、班主任之間的矛盾，以及教會學校學生對聖經教育的不滿，然後組織貧苦學生抗爭，並從其中發展黨員<sup>㉙</sup>。中共早期在工人中也有嚴密的網絡，但因為國共合作破裂後革命重心轉向農村，工人運動出身的精英並沒有在中共領導集體中佔據重要地位。

在農村的書店和社會組織也可見中共活動的痕跡，而這是國民黨和軍閥力量完全不可以長期維持的地方。從農村直接捲入中共革命的政治精英，往往在之前就已經參與各種自發的農村抗爭，遇到中共後則自覺找到了能夠將運動擴大的機會。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在書店做學徒時，因對老闆不滿，多次組織社會運動<sup>42</sup>。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則是在家鄉做木工，長期參加農民運動，在黃麻起義中與中共接觸<sup>43</sup>。中共警衛系統的創始人張宗遜，則是在反對查煙官員的抗爭中逐漸結識了中共負責人<sup>44</sup>。非黨化的草根農民運動是獨立於國民黨革命和中共革命之外的社會抗爭，是中國傳統農民起義在現代的延續<sup>45</sup>。它本身並沒有主導民國的政治生態，卻將一些激進份子推入危險境地，進而促成了他們向中共組織尋求保護。對這些已經捲入激進政治的人來說，依託一個有形的組織，無疑比繼續孤立而自發地參與抗爭要穩妥可靠。這就引出了另一個重要因素：國家鎮壓對社會運動激進化的作用。

對於中共革命過程中的路徑依賴現象，已經有學者做過闡述，即革命者長期接受職業革命家訓練，缺乏基本謀生技能，一旦捲入革命就只能終身革命<sup>46</sup>。在這裏，筆者補充一種具體機制：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頻繁經歷學潮和農民暴動，社會抗爭幾乎成為常態。許多年輕人捲入抗爭性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偶然衝動或政治上的不知情。然而，一旦被當局貼上標籤，標定為鎮壓對象，他們就只能繼續走激進抗爭道路，否則便有個人安全問題。

就中共革命的具體情形而言，由於早期國共兩黨分野並不明顯，一些人在與共產黨接觸後也並不知情，國共合作破裂時則被當成共產黨遭到排斥、鎮壓，最後反而堅定了被排斥和受鎮壓者加入中共的決心。許多傳記資料都提到了中共精英在反共浪潮中「逆流而上」加入中共的「英勇」舉動，但只有極少數回憶錄或自述作品清楚地闡明了背後的具體機制。陳伯達因為家貧無力返校銷假，只得在汕頭軍閥部隊擔任政治秘書，期間與中共工作者合作辦報，並因為工作出色受到中共福建省委領導人的接見。他對此並不知情，但在清共浪潮來臨時，卻被軍閥當作共產黨點名要求清除。陳在此種情形下也只能「逆流而上」，正式加入中共<sup>47</sup>。羅瑞卿在黃埔軍校期間曾有意加入中共，但未立即獲准。國共關係破裂後，所在部隊在征戰中逐漸瓦解，他本人又遭到軍閥懷疑，被認為與中共過從甚密，於是加入中共的決心變得十分堅定，乾脆脫離部隊尋找組織<sup>48</sup>。粟裕在校讀書時只是加入共青團，但在學潮中與富家子弟交惡，雖然僥倖免於開除，但自思已被校方認定為共黨份子、難逃鎮壓，國共合作破裂時便逃離學校、尋找中共<sup>49</sup>。後來陳伯達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筆桿子，羅瑞卿長期負責公安工作，粟裕則在內戰中成為中共最得力指揮官。

組織覆蓋機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共革命動員的一般方式：促使被動員者在某個起點捲入激進政治，或者重點發展那些已經自發捲入激進政治的人；由於擔心國家鎮壓或主導社會階級的報復，捲入者往往從此下定決心追隨中共；而中共極具滲透性的列寧主義組織網絡，又將這一機制複製推廣到國民黨和軍閥勢力難以到達的小城市和農村，從而為革命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這種動員方式，在土地革命中尤為明顯<sup>50</sup>。

此外，筆者也對組織覆蓋機制的具體分布情況做了一個簡單的定量描述（見表3），重點關注中共建國精英是在甚麼環境中遇到並加入共產黨組織的。統計結果表明，經過組織覆蓋機制加入的有60人，主要有六個基本類別：學校、留法計劃、留俄計劃、學術和出版機構、工人和農民運動以及親緣關係。一個相對難以歸類的情況是上文提到的政治迫害。這些精英曾在軍閥服役，但並沒有經歷理性選擇過程——他們加入中共只是由於被貼上了「通共」的標籤。此處筆者也將他們歸入組織覆蓋機制。與政治選擇機制的王維舟類似，組織覆蓋機制也有一個特殊案例——建國後擔任全國總工會執行書記的劉長勝。劉長勝早年家境貧困，隨親戚到俄國符拉迪沃斯托克碼頭打工，在當地捲入激進政治並加入蘇聯共產黨，1927年後才轉入中共並回國工作。這裏也將其歸入組織覆蓋機制，儘管是蘇共組織<sup>60</sup>。

表3 組織覆蓋機制的分布情況

黨員加入中共的具體場所和途徑	正式委員	百分比	候補委員	百分比
學校(學潮、與中共教師的接觸等)	13	41.9%	19	65.5%
留法計劃	7	22.6%	0	0%
留俄計劃	2	6.5%	0	0%
學術和出版機構	4	12.9%	0	0%
工人和農民運動	3	9.7%	6*	20.7%
親緣關係	2	6.5%	2	6.9%
清共時的政治迫害	0	0%	2	6.9%
<b>總計</b>	<b>31</b>	<b>100%</b>	<b>29</b>	<b>100%</b>

\*包括中共工會領導人劉長勝的特殊案例

定量分析的最主要結論是學校網絡對中共形成的重要性。高達41.9%的正式委員和65.5%的候補委員是在學校(主要是初等學校)遇到了中共組織。這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中共整體的文化教育背景和基本招募模式。留俄計劃類別下加入中共的人數非常之少，僅佔組織覆蓋機制總體的不到7%，似與人們對中共歷史的觀感不符。這是因為許多精英在留俄以前就已經加入了中共或中共的外圍組織，比如李立三、聶榮臻等都是在法國加入共產主義小組後前往蘇聯學習<sup>61</sup>；又如王明和博古都是在國內學校成為中共積極份子後被安排到蘇聯學習<sup>62</sup>。但留俄經歷極大地鞏固了這些人對中共的認同。

#### 四 中共精英的入黨歷程如何影響其對「共產主義」的理解

筆者陳述了中共建國精英接受共產主義的三種機制：階級阻隔、政治選擇和組織覆蓋。階級阻隔剝奪了革命者進入上流社會或國家政權的機會，使革命者更有可能暴露在激進政治的影響下；政治選擇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機制，選擇者往往具有共和革命和軍事背景，出於對中共動員手段和軍事組織技術的興趣而加入中共；組織覆蓋則為已經捲入激進政治、擔心國家鎮壓者

提供保護。階級阻隔機制具有最廣泛的解釋力，它是一個「覆蓋性法則」，能夠解釋為甚麼中共精英沒有成為國民黨成員或專業技術人才，而政治選擇和組織覆蓋機制則是具體的「解釋性法則」，闡述了中共精英捲入激進政治的具體形式和時點。

這三種機制都不是決定論式的，並不能「保證」某個個人一定會走上共產黨革命道路。比如留俄學生中最後只有很少一部分回國繼續革命，其中一些甚至加入國民黨<sup>⑤</sup>。筆者也不排除還有其他一些次級機制在起作用，比如逃婚。逃婚是中共建國精英轉向共產主義的一個中介機制，也非常符合社會運動理論中新舊價值體系衝突促成革命的假設：在新式學校接受了西方教育，進而對家庭安排的包辦婚姻不滿，與家庭決裂後來到大城市上學或參軍，遇到了中共網絡<sup>⑥</sup>。此外，階級親和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共精英普遍教育程度較低，而馬列著作又非常艱深，此時其實只是一種模糊的感覺推動他們接受馬列主義。一些革命者在傳記中提到，雖然當時自己並不能理解艱澀的馬列著作，但能夠感到其討論的是「勞苦大眾」的事<sup>⑦</sup>。另外，也有中共精英在人格上具有不安分的特點。有些人已經獲得了安穩的工作，卻不甘就此過平穩的生活<sup>⑧</sup>。還有人儘管文化程度並不高，卻非常善於將個人生活困境歸因於社會制度的不合理，進而與強調社會結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產生親和<sup>⑨</sup>。有論者認為，參加革命本身還為一些人提供了審美上的愉悅，比如自我犧牲，以及在接近民眾的同時保持自身高雅情趣的優越感<sup>⑩</sup>。最後，不能否認革命領袖的巨大感召力。一些革命精英在回憶錄中提到，自己追隨中共，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早年受到毛澤東或周恩來個人魅力的影響<sup>⑪</sup>，然後才在經歷種種變故後最終加入共產黨。如果我們注意中共精英以幾所師範學校（山西師範、湖南師範等）為中心的密集分布，就很容易看出革命領袖個人魅力通過人際網絡產生的深遠影響。每個人加入中共革命都有自己的獨特機緣，筆者在這裏只是試圖歸納三種比較重要的機制。

從這三種主要機制可以推測中共建國精英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解。在這裏，重要的不是追問他們是否真正理解馬列主義，而是推測他們如何理解馬列主義。筆者也並不認為革命經歷對個人後來的政治選擇具有決定作用。在承認存在大量例外的基礎上，筆者試圖陳述幾點機制性的推論。

首先，具有共和革命和舊軍閥背景的中共精英，很可能只是對共產黨的革命動員和軍事組織技術感興趣。至於革命成功後的中國社會應當如何組織，這些人並沒有深入思考。或者，他們更有可能期待建立一個符合三民主義思想、多階級合作、富足和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對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爭奪較少興趣。例如朱德、董必武、張雲逸等人在建國後淡出了權力中心（與他們年事已高也有關係），呂正操和萬毅擔任了軍事技術性領導職務（分別任鐵道部部長和總參裝備計劃部部長），劉伯承則主動退出軍隊領導層，創辦南京軍事學院。

其次，具有留學海外背景的中共精英會更多思考革命後中國社會的組織形態，因為他們對國外情況有直接的感知。比如，留俄學生認為蘇聯的相對發達是共產主義制度的結果，他們不僅相信俄國革命模式的有效性，也認為革命後的中國應該成為蘇聯那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或許這是劉少奇、王稼祥

等留俄學生在建國後較為推崇蘇式計劃經濟的重要原因。留法學生也可能具有類似的關切，對他們來說，共產主義本身或許並不清晰，但至少期望中共能創造一個超越西歐資本主義的國家。周恩來、李富春、鄧小平等人在革命後帶有技術官僚色彩，很可能與此有關。

再者，在國內農村或初等學校遭遇共產黨而捲入激進政治的中共精英，更有可能關注階級平等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捲入激進政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具體的階級憤懣，如官吏的欺壓、與富家子弟的衝突、地主的逼債等。這一群體人數最多，對建國後中共的政治走向有很大影響。一方面，他們缺乏海外留學生對西方物質文明的直接感知，追求現代化的意願或許十分強烈，但沒有具體的模版和路徑；另一方面，他們在進入中共以前沒有穩固的三民主義、階級合作思想基礎，又比純粹出於軍事和動員目的選擇中共的舊軍官有更強的意識形態關切。其結果是，這一群體很容易被偏離經濟現代化、追求階級鬥爭的激進意識形態左右，進而成為破壞性政治運動的基礎（至少是沒有積極地抵制這些運動或提供替代性路徑）。比如，建國初期中共發展軍事學院以培養現代軍事人才的努力，就受到高級軍官的集體抵制，進而演變成破壞性的「反軍事教條主義運動」<sup>⑥</sup>。

當然，以上分析並不是一種「革命過程決定論」——精英在建國前的政治態度「決定」其在建國後的政治立場。即便在建國以後，中共精英的政治態度也是不斷變化的，一些造成重大傷害的歷史事件（如大饑荒和文革），以及改革後對西方世界認知的突然增加，能夠從根本上重塑中共精英的政治立場。另外，建國後的政治變遷是一系列國內國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比如關於中共熱衷大躍進和政治運動，就可以從革命前的工業基礎、中國對蘇聯的批判、外部地緣政治影響等多個角度做出解釋<sup>⑦</sup>。精英的組織文化是否對這些結構性因素之間的動態組合產生了影響，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並且已經引起學界注意的問題<sup>⑧</sup>，但無論如何這只是全部歷史解釋的一部分。

我們還可以從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比較的角度來探討中共建國精英對共產主義的理解。中共與俄共有一定相似性，比如兩黨建國精英中都沒有伊斯蘭—突厥背景的革命家<sup>⑨</sup>，但更主要的是差別。俄國布爾什維克選擇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族裔政治。俄共建國精英有三分之二為非俄羅斯少數族裔，在社會運動中頻繁遭遇民族主義的排擠。他們普遍嚮往寬容而多元的普遍性帝國文化，而淡化民族差別的共產主義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普遍主義意識形態<sup>⑩</sup>。類似情況也可以在南斯拉夫和其他東歐國家見到<sup>⑪</sup>。這一背景在中共革命中是完全缺席的：77名中共建國精英中只有5名是少數民族（關向應、滕代遠、粟裕、烏蘭夫、萬毅），而且中共革命長期在漢族地區進行，族裔衝突並不構成革命發展的動力<sup>⑫</sup>。如果做進一步的拓展，我們可以發現，東歐革命大多具有族裔政治背景，在民族關係複雜地區，共產主義由於提供了普遍主義意識形態而具有一定吸引力；而東亞革命則不具有這一背景，共產主義更多是階級動員的工具。兩類共產主義革命的這一基本差別，值得進一步研究。

最後，筆者從理論上對全文做一個總結。革命者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即抗爭政治的激進化過程，是社會運動研究的一個經典議題。中共建國精英的

經歷覆蓋了西方學者提出的大部分機制，包括經濟危機或蕭條導致的社會排斥和階級阻隔<sup>⑥</sup>、新舊價值體系交替過程中出現的角色緊張和認同危機<sup>⑦</sup>、國家的鎮壓、意識形態的灌輸和既有的革命網絡讓革命者相信繼續革命是安全而有前景的<sup>⑧</sup>。目前遺留下來的問題是「革命的後果」，即中共精英的革命經歷如何影響了他們在後革命時代的政治行為和政治選擇。這在社會運動理論中是一個長期的分析難點，因為很難將社會運動的影響與其他社會變遷的效果分離開來<sup>⑨</sup>。筆者在這裏也只是根據有限資料做了一些初步推測，希望能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礎。

### 註釋

① 關於政治危機理論的經典解釋，參見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ichael Y. L. Lu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 1920-1928*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階級解釋和民族解釋的代表性觀點，參見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暴力和強制解釋的代表性觀點，參見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③ 比如 Robert C. North,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④⑤ 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 15-16；10-11。

⑤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 12-13。

⑥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 21-25；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33-52；陳志凌、賀揚：《王若飛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 21-35。

⑦ 《林伯渠傳》編寫組：《林伯渠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6），頁 21-22。

⑧ 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頁 23。

⑨ 陳志凌、賀揚：《王若飛傳》，頁 22-23。

⑩ 陶菊隱：《蔣百里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10；朱信泉、嚴如平主編：《民國人物傳》，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90。

⑪⑫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 123-24；129。

⑫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 18-24。

⑬ 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究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頁 82-85；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 23-30；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 26；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 18-19。

⑭ Shmuel N. Eisenstadt, *Revol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228-31.

⑮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⑮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上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33-35。
- ⑯ 《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第四章。
- ⑰ 陳予歡編著：《黃埔軍校將帥錄》（廣州：廣州出版社，1998），頁30-31。
- ⑱ 鐵竹偉：《廖承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65-66。
- 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33。
- ⑳ 《董必武年譜》編輯組編：《董必武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41-42。
- ㉑ 反映「戰爭與國家形成」的代表性社會學文獻，參見Brian M. Downin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Thomas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ohn A.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Oxford: Blackwell, 1985);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88);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0)。
- ㉒ 萬毅：《萬毅將軍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54-55。
- ㉓ 呂正操：《呂正操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57、75-76；20。
- ㉔ 張小雷：〈徐特立的「十年破產讀書」計劃〉，《黨建》，2010年第2期，頁53。
- ㉕ 陳乃宣：《陳潭秋》（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頁13-37。
- ㉖ 斯諾(Edgar Snow)錄，翟象俊譯：《毛澤東口述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頁73-85。
- ㉗ 曉英：〈王維舟：入黨比建黨還早的革命家〉，《黨史博采(紀實)》，2010年第11期，頁28-31。
- ㉘ 代表性的觀點參見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chap. 4。
- ㉙ 比如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382。
- ㉚ 關於中共組織的滲透性及國民黨滲透性的不足，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2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㉛ 關於國家鎮壓促進激進政治的代表性觀點，參見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The Rise of Clas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s. 15, 17, 18; Victoria E. Bonnell, *The Russian Worker: Life and Labor under Tsarist Regim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㉜ 柳勉之：〈蔡暢小傳〉，《湘潮》，1988年第4期，頁18。
- ㉝ 李玖蔚：〈曾山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形成〉，《黨史文苑》，2005年第14期，頁31-32。
- ㉞ 林強、陳日增：〈曾鏡冰戰鬥在閩浙贛〉，《黨史資料與研究》，1985年第2期，頁41-51。
- ㉟ 陳靜：〈追隨父輩的足跡：訪李葆華同志〉，《北京黨史研究》，1993年第1期，頁44-46。
- ㊱ 劉文秀編著：《林彪》（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頁1-5。
- 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9-26。
- ㊳ Lincoln Li,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4-1949*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88-91。
- ㊴ 程子華：《程子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5-6；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頁10；景玉川：〈饒漱石在九江〉，《黨史文苑》，2012年第9期，頁15-18。
- ㊵ 《譚震林傳》編纂委員會：《譚震林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4-12。
- ㊶ 朱玉主編：《李先念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第二章。
- ㊷ 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8），頁1-3。

- ④⑤ 關於民國時期非共產黨領導的農民抗爭，參見Lucie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 ④⑥ 《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4-17；19。
- ④⑦ 點點：〈羅瑞卿入黨軼話〉，《炎黃春秋》，1991年第1期，頁38-43。
- ④⑧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12-13。
- ④⑨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chap. 3.
- ④⑩ 馬飛海：〈懷念劉長勝同志〉，《上海黨史與黨建》，2003年第6期，頁41。
- ④⑪ 華強：〈李立三的坎坷人生〉，《炎黃春秋》，2003年第8期，頁19-20；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7-35。
- ④⑫ 周國全、郭德宏：《王明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頁8-10；李志英：《博古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24-33。
- ④⑬ 《劉少奇傳》，頁16；穆欣：《陳賡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9-10。
- ④⑭ 穆欣：《陳賡傳》，頁11-12。
- ④⑮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頁10-25。
- ④⑯ Hung-yok Ip, *Intellectual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1-1949: Leaders, Heroes and Sophisticat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9-10.
- ④⑰ 張國君編著：《譚政大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第一章；《葉劍英傳》編寫組：《葉劍英傳》，第四章。
- ④⑱ 王亞志口述，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係見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214-23。
- ④⑲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36-84.
- ④⑳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1).
- ④㉑ 關於俄共與伊斯蘭民族運動的關係，參見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55-60。
- ④㉒ Liliana Riga, *The Bolsheviks and the Russian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④㉓ Roman Szporluk, "After Empire: What?", *Daedalus* 123, no. 3 (1994): 21-39.
- ④㉔ Xiaoyuan Liu, *Frontier Passages: Ethno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45*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④㉕ Jeffer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 ④㉖ Seymour M. Lipset, "Radicalism or Reformism: The Sources of Working-class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 no. 1 (1983):1-18; Robert Wuthnow,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Ideolog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European Soci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④㉗ William H. Sewell, Jr.,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7, no. 1 (1985): 57-85; Jack A. Goldstone, "Revolution",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ed. Todd Landman and Neil Robinson (Los Angeles: SAGE, 2009), 319-47.
- ④㉘ Macro G. Giugni, "Was it Worth the Effort? The Outcom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1998): 371-93.